

# 中 国： 历史、经济、意识形态 的基本问题

[苏] 米·伊·斯拉德科夫斯基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联研究所

# 中 国： 历史、经济、意识形态 的 基 本 问 题

〔苏〕米·伊·斯拉德科夫斯基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一九八〇年十月

## 说 明

近些年来，苏联学术界为适应苏联领导集团推行反华政策的需要，出版了一系列反华著作。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年》（论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中共领导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宣传》、《没有毛的毛主义》（论文集）、《危险的方针》（报刊反华言论汇编）、《“文化革命”后的中国》、《中国近代史》、《俄中边界形成史》、《三十年——三种政策》等书。

本书是这些著作中的一种，作者M·И·斯拉德科夫斯基曾多次来过中国。一九二六年第一次来华，在上海共产主义大学任教；一九四五年苏军进军东北后，他以驻东北苏军司令的一名经济顾问身份从事活动；一九五八年出任苏联外贸部远东局局长，同年以苏联政府贸易代表团团员、专家组组长的身份来北京参加当年的中苏贸易谈判。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出任苏联驻华商务代表。以后，他主要在研究机构工作，一九六六年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一九七二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作者在本书中采取篡改历史、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手法，从近代史发展的角度，就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以及中苏两国的领土争端等问题大肆反华，诬蔑我搞大汉族主义、反苏主义和霸权主义。这是一本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反华新作，现将此书全文译出，以供批判参考之用。

这本书涉及的问题较多，引用了不少中苏关系历史资料，译文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承蒙中央档案馆、北京图书馆、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大力协助，查找了许多重要历史资料，在此特致谢意。

本书根据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8年版本译出

## 作　者　的　话

本书阐述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主要问题。

本书的基础是作者于最近三、四年内在国内外各种科学会议和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报告和讲演。

作者给本书提出的任务是：阐述自己对现代中国最现实的问题的理解；对资产阶级汉学家的观念给予批判的分析；揭露毛分子对马列主义学说和苏中关系史的蓄意伪造。

书里有关于苏中关系史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的新资料。

作者向参加讨论本书所涉及问题的苏联国内外学者们表示感谢。

# 目 录

作者的话	
<b>第一章 列宁和中国</b>	(1)
列宁和民族殖民地问题	(7)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12)
苏联对华的列宁主义政策	(15)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者的 思想旗帜	(22)
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反对列宁 主义	(29)
<b>第二章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b>	(38)
觉醒了的亚洲条件下的中国辛亥革命	(38)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	(48)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通往社会主义 的指路明灯	(53)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对中国革命的意义	(54)
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革命政变	(60)
中国的苏维埃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66)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78)
毛泽东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新民主主义” 理论和分裂活动	(85)
东北革命根据地及其作用	(92)
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100)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04)
总路线的顺利实施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 大会.....	(107)
“特殊”的方针——恢复延安的方法.....	(110)
加速中国军国主义化和与反动势力结盟的毛主 义方针.....	(121)
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	(128)
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中 的反马克思主义.....	(133)
<b>第三章 毛主义是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     态和政策.....</b>	(142)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观点的形成.....	(142)
毛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主要阶段.....	(144)
毛主义和社会科学.....	(154)
毛分子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唯意志论.....	(157)
毛分子在社会上的蛊惑宣传和真实情况.....	(159)
亲帝国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	(163)
毛分子的反社会主义方针得到美国的支持.....	(166)
寻求同日本和西欧反动的复仇主义集团结盟.....	(168)
毛主义暴露出自己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171)
<b>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派领导人对领土要求     的狂妄性暴露了他们的扩张主义意图.....</b>	(175)
毛派领导集团觊觎的苏联远东领土的真正主人 及早期的俄中关系.....	(179)
在英法侵略面前俄中两国利益的一致性.....	(183)

十九世纪中叶的俄中关系	(188)
俄中天津条约和俄中北京条约的补充协定	(201)
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都确认关于标定国界的 条约	(205)
领土要求是对邻国人民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的 最重要部分	(208)
<b>第五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b>	(214)
旧中国的沉重遗产	(21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国家对主要经济部门 的控制	(2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九四九 —一九五二年）	(234)
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	(241)
背离中共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奉行建立军国主 义国家的毛主义方针	(252)
“整顿和调整”的政策	(255)
“文化革命”和国家全面军国主义化的毛主义 方针	(258)
向资本主义世界靠拢的方针	(260)
毛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264)
“自力更生”不可能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现代化问题	(273)
“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强国”的号 召和现实	(278)
引文出处	(283)

# 第一章 列宁和中国

弗·伊·列宁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在研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进化，即已进入其发展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时，弗·伊·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固有的规律，对国际垄断组织的扩张主义作了极深刻的分析。垄断组织既是帝国主义竞争者之间又是一小撮帝国主义国家和广大殖民地、附属国及其人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产物。

弗·伊·列宁论述了帝国主义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制定了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战略和策略，创建了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核心的布尔塞维克党。

列宁主义是各国劳动者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弗·伊·列宁号召全世界劳动者和一切进步力量要在国际主义基础上联合和团结起来，以对抗帝国主义这个国际反动势力。列宁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不仅要引导整个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而且要引导全部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者群众跟着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①。在预料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时，弗·伊·列宁曾向共产党人阐述：“……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

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②。

弗·伊·列宁特别注意研究东方国家包括中国的历史。在他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里，就有大量的论中国的引文，都是从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历史文献巨著中摘录的。例如：布·耳·马凯：《中国，中华民国。它的问题和前途》；詹姆斯·坎特利和谢里登·琼斯：《孙中山和中国的觉醒》；福斯堡—雷科夫：《亚洲的革命》；约瑟夫·雷恩：《论俄国在中国的目的》；麦·冯·布兰特：《东亚问题》；威廉·许列尔：《中国现代简史》及其它著作③。

弗·伊·列宁一面熟悉有关中国的历史文献，一面注视着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运动，对中国社会生活中一切最重大的事件，总能找到时间作出反应。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开始瓜分中国，分割“势力范围”。资产阶级科学企图证明垄断资本的扩张意图是中国“传播文明”的，似乎中国还没有学会自主地管理国家。资产阶级思想家把中国人民的任何反帝举动都描绘成对欧洲文明的造反。

弗·伊·列宁坚决捍卫中国的主权，并号召俄国无产阶级同加入掠夺政策的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斗争，“欧洲各国资本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④这种掠夺政策了……他揭露资产阶级国家的殖民政策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也给俄国和其它遭受战争的各国劳动者带来灾难。发动这些战争，“对一小撮同中国作生意的资本家大享有利，对一小撮为亚洲市场生产商品的厂主有利，对一小撮现在靠紧急军事定货大发横财的包工头有利……”⑤。

弗·伊·列宁用大量事实揭露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

和奴役政策，无情地暴露资产阶级宣传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传播文明”作用的虚伪性。弗·伊·列宁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割势力范围、分享利益和分割殖民地等等，除了以分割者的实力……不可能设想以其它的东西为根据”⑥。

弗·伊·列宁在分析中国是帝国主义侵略对象这一形势特点时，也看到了中国社会生活过程的另一个方面，即在西方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所发生的这个过程。列宁把中国进入社会发展新阶段称为亚洲的觉醒⑦。

弗·伊·列宁在一九〇八年曾写道：“在中国，反对中世纪制度的革命运动近几个月来也表现得非常强烈。的确，对这个运动还不能作出明确的估计，因为关于这个运动的消息很少，而关于中国各地造反的消息却很多，但是，‘新精神’和‘欧洲思潮’在中国的强有力的发展，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以后，是用不着怀疑的，所以中国的旧式骚动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⑧。

早在中国反对君主专制的社会政治运动初期，弗·伊·列宁就曾指出其特点和规律性与西方革命运动相同，必然会从低级的“造反”形式转变为自觉的政治活动。就民主革命者孙中山首先创立的思想和理论的全部特征而言，弗·伊·列宁看不出它们与举世皆知的、反映社会发展一般过程的社会政治学说有何原则区别。列宁说，孙中山观点中一些个别的独特之处，是属于理论上的幼稚，这是中国社会生活本身发育不足和经济基础薄弱、不够发达造成的结果。

一九〇六年，孙中山提倡的用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对中国革命进行改造的纲领，得到了弗·伊·列宁的热烈同

情和支持。“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漠，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⑨。

弗·伊·列宁在指出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的同时，曾指出了他的纲领的历史局限性：“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中国正处于工业’（即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前夜’，中国‘商业’（即资本主义）‘将大大发展’，‘五十年后我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即拥有几百万人口的资本主义财富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⑩。

在孙中山的观点中，一方面是否定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则阐述了实质上仍属资本主义的土改纲领。弗·伊·列宁在着重说明孙中山观点的这种极端矛盾时曾写道：“问题也就在这里。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⑪

孙中山没有弄清资本主义的规律和动力，也就不可能看透涂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

根据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辛亥革命的经验，列宁曾预言，

中国资产阶级有背叛的倾向。一九一二年，他曾提出这样的推测：“刚刚从自由保皇派变成自由共和派（能长久吗？）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将在君主制和革命之间实行随风倒的政策”<sup>⑫</sup>。

众所周知，这一推测后来得到了证实。袁世凯按照极其苛刻的条件，从国际银行团借债约二亿五千万卢布（二千五百万英镑），用以巩固反动阶级的地位，并于一九一六年企图称帝。

弗·伊·列宁看到：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弱点在于，孙中山领导下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还不能充分地吸引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所以没有一个能够坚决而又自觉地将民主革命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先进阶级。由于没有无产阶级这个领导者，农民非常闭塞、消极被动、没有知识、对政治漠不关心”<sup>⑬</sup>。

弗·伊·列宁早在一九一三年就曾指出，中国南方和北方当时的形势是有区别的。

弗·伊·列宁写道：“孙中山的党依靠的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受欧洲影响最大、最先进的南方。”袁世凯的党依靠的则是中国落后的北方”<sup>⑭</sup>。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中国人民也是一个历史的关键。从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初日子里，弗·伊·列宁就非常重视同中国的关系。根据弗·伊·列宁的指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苏维埃政府通过驻彼得堡的中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议磋商废止一八九六年的中俄条约、一九〇一年北京和约（义和团条约）和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六年期间沙俄与日本就中国问题签订的一切协定，并在承认双方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两国人民主权的基础上缔结新约。

为了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不仅向正式的北京政府，而且也向反映中国进步的社会人士意志的南方政府发出了呼吁。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出了《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在这一宣言中就包含着苏维埃政府提议废止上述俄中条约，宣告苏维埃俄国放弃“义和团”赔款（即庚子赔款——译者注）和沙俄行使的一切权利和特权，以及根据这些条约条款奉送给沙俄的一切权力，包括在中国领土上的治外法权。宣言中说：“苏维埃政府深知：同盟国（协约国——作者注）和日本这一次仍将千方百计阻挠俄国工农的声音传到中国人民广为归还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必先扫尽盘据满洲和西伯利亚的强盗。所以，现在它向中国人民发出自己的通告，并派遣自己的红军，越过乌拉尔挺进远东，帮助西伯利亚工农脱离高尔察克匪徒及其同盟者日本的压迫”。

“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做象俄国人民一样的自由人民，避免凡尔赛和约陷中国于朝鲜、印度第二的恶运，深望中国人民明了其在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乃是俄国工农及其红军”<sup>⑯</sup>。

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主权的进攻和彼此间为争夺中国市场而进行的斗争，他们千方百计地阻碍苏维埃俄国同中国建立联系，使列宁主义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影响与中国人民相隔绝。

苏维埃政府致正式的北京政府的各项宣言，没有得到回答。

---

\* 见第二章

中国的反动集团依仗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力图把中国人民束缚在落后状态之中，成为偏见和尊儒的俘虏。

然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所产生的新时代的思想潮，也不可能不影响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根据平等和民族独立的原则，建立自己同各族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关系的。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夫子的传统的民族中心主义的理论破产了；联合同一肤色的“黄种人”国家资本主义日本，以对抗西方“白种人”的幻想破灭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伪善也被揭穿了。威尔逊在中国民主主义者（包括孙中山博士在内）的心目中曾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即希望得到列强的经济援助并在巴黎和会上解决战后问题时承认中国的平等权力。中国仍旧处在半殖民地状态。

中国社会的先进代表们到马列主义那里寻找解决迫切问题的答案。列宁党领导的俄国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结成联盟，完成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具体体现出来的经验，给中国的先进代表们指出了革命改造的具体道路。

### 列宁和民族殖民地问题

列宁的学说对于东方、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都具有极大的意义。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活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当时帝国主义的矛盾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还不具有明显的国际性质，因而还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式最后最高阶段的规律性。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殖民地问题及其在总的反帝斗争中的作用，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中还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具体的阐述。

东方杰出的共产主义领导人胡志明同志曾写道：“如果说，

列宁对西方无产阶级来说，是领袖、首领、导师的话，那么，对东方各族人民来说，就更加伟大。他对于东方人民来说是圣哲，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列宁不仅以其天才远见，而且以其鄙视荣华富贵、热爱劳动、个人生活清白、平易近人，一句话，以一位导师的伟大精神和高尚品德，博得亚洲人民的信任并吸引着他们的心”<sup>⑯</sup>。

弗·伊·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的报告中及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中，集中地阐述了他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观点。

在研究民族和民族殖民地问题时，弗·伊·列宁特别注意殖民地国家经济的农业性质，把农民问题放到中心位置上。分析农民的社会成分时，弗·伊·列宁则把他们分成三类，他确信这三类农民在为社会主义改造而进行的斗争中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弗·伊·列宁把农业无产阶级列入第一类，并认为“把他们吸引到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来，这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sup>⑰</sup>。

半无产阶级和极小农列入第二类，他们“一方面依靠……出卖劳动力，另一方面依靠在……小块私有土地或租佃土地上耕作，来获得生活资料”<sup>⑱</sup>。

小农属于第三类，他们“拥有自己的或租来的小块土地，可以应付他们家属和自己经营上的需要，并不需要雇佣他人的劳动力”<sup>⑲</sup>。

这三类农村居民构成一种社会基础，正如弗·伊·列宁所说，它可使“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仅在城市内，而且在农村

中”<sup>20</sup>都有保证。

对于中农，即“雇佣他人的劳动力”<sup>21</sup>的小土地占有者，弗·伊·列宁提议应当只限于中立他们，即“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时使他们中立”<sup>22</sup>。

弗·伊·列宁说，劳动农民是可靠的同盟军，但是“只有在这些倍受压迫的人在实践中看出他们已经有这种有组织才能的十分坚强果断的领袖和保护者来帮助和领导他们，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以后”，“才能坚决地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sup>23</sup>。

弗·伊·列宁指出，在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还必须有其它阶级的同盟军。

鉴于这些国家中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且是刚刚走上政治舞台，在社会生活中还不能占据领导地位，弗·伊·列宁指出，必须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列宁指出，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倾向，但它在自己国家的民族复兴和消除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的一切特权方面，也有利害关系。

列宁的这些意见为共产国际的决议奠定了基础。在委员会中讨论这些意见时，一致决定支持民族革命运动，尽管它还带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任何民族运动——列宁说——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sup>24</sup>。

弗·伊·列宁在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中（首先是在农民运动中）、在被压迫国家的人民中，看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因此，他号召工人，首先是被压迫国家本国的无产者，以及殖民主义强国的无产者，要用一切方法帮助农民去同地主和大土地占有者进行斗争。列宁号召揭露反动的宗教界和大伊斯兰主义，因为它们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其可汗、地